

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

梁 云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呼伦贝尔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 内蒙古 海拉尔 021000)

[摘 要]结合文献与考古得知,拓跋鲜卑从发祥地大鲜卑山游猎到河套阴山建立部落联盟,历经两次大规模迁徙,即从大兴安岭北段西南迁至呼伦湖周围再由呼伦湖西迁至蒙古高原腹地。而拓跋鲜卑由大兴安岭林海西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又西迁至蒙古高原阴山地区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有拓跋鲜卑本族的原因,汉、匈奴、乌桓、东部鲜卑等周围部族的原因以及生存环境、地理状况等原因。

[关键词]拓跋鲜卑;西迁;原因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1)04-0058-05

民族迁徙是指古代世界各地的部落集团大规模流动的历史现象,具有世界性。在欧亚大陆上,从兴安岭到喀尔巴阡山偏南地区,形成北部游牧区和南方农业区两个特征鲜明的板块。纵观世界历史,民族迁徙的总趋向是北方游牧民族频繁地向南部农耕地区迁移,其中规模较大的发生过三次^①。其主要原因是农耕地区的各种文化对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繁衍、生息、劳作于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从先秦时期的戎狄,秦汉时期的匈奴、东胡、乌桓、鲜卑,魏晋时期的拓跋鲜卑、敕勒、柔然,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辽金元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到明清时期的建州女真,只要不是中原王朝采取强硬的阻拦手段或武力阻击,迫使他们无法向南发展甚至在北方亦无法立足不得不西向迁徙(匈奴西迁、西辽建立),都先后由北向南发展,甚至进入中原内地,其中拓跋(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和满族(清)还建立了由北而南的政权,且疆

域广阔。可见,中国古代三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游牧部落集团在迁徙发展方面具有共同点,其主流是向南迁移。

拓跋鲜卑从发祥地大鲜卑山出发来到阴山河套地区,初始的迁徙方向是向西。为什么拓跋鲜卑没有如其他北方民族那样一开始就南向中原?是客观条件不成熟还是主观上没有向南发展的意图?抑或此时的西迁才是有利的、明智的选择?以往学界对这个问题已有一定的研究,但仍存争议,特别是对拓跋鲜卑早期两次迁徙的内因与外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今天,虽然史籍和考古成果仍然有限,但已能够进一步对拓跋鲜卑早期迁徙的原因进行探讨。

关于拓跋鲜卑的起源及其迁徙,《魏书·序纪》中的记载不过数百字。对于研究拓跋鲜卑迁徙问题具有参考价值的内容是,拓跋鲜卑的始祖乃黄帝之孙后裔,“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科研项目(2002年)。

[收稿日期]2010-01-15

[作者简介]梁云,女,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副教授,内蒙古大学专门史博士研究生。

① 公元前18~16世纪,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赫梯入侵两河流域,雅利安人入侵印度;4~6世纪,中国魏晋时期匈奴南侵、“五胡乱华”,厌哒人入侵伊朗、印度,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冲击东西罗马帝国;12~15世纪,突厥人、蒙古人对黄河、长江流域的冲击。

山,因以为号……推寅立,南迁大泽……诘汾(时),有神兽……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1]〔卷1,《序纪》PP.1~2〕。这寥寥无几的文字使史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拓跋鲜卑迁徙这一问题的研究只能停留在对大鲜卑山、大泽、匈奴故地的考证上。1980年嘎仙洞石刻祝文的发现^[2]为拓跋鲜卑起源地大鲜卑山确定在大兴安岭北段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北部)、大泽(今呼伦湖)的地理位置也得以推定。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也给予我们较为详细的补充和直观的说明。经过考古发掘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墓群^①、陈巴尔虎旗完工墓群^②、呼伦贝尔市团结墓地^[3]〔PP.3~15〕、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墓群^[4]、新巴尔虎右旗红星村墓群^[5]、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墓群^[6]、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墓群^[7]、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墓群^[8]〔PP.99~101〕、三道湾墓地^[9]〔PP.16~54〕均被认定为拓跋鲜卑迁徙过程中的遗存。将这些点连接成线,可以大致勾勒出拓跋鲜卑的迁徙路线^[10]。

一、拓跋鲜卑从西南迁至大泽之原因

拓跋鲜卑先世在大兴安岭北部林区繁衍生息七十余世,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1]〔卷1,《序纪》P.2〕。在推寅立为君长后,率部从起源地大兴安岭北段向西南迁至呼伦湖附近。究其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条件所导致的生存环境是拓跋鲜卑从西南迁至大泽的原因之一

大兴安岭北段的原始驻牧地限制了拓跋鲜卑的发展。随着拓跋鲜卑人口的增长、社会的发展,需要新的生存空间。在发源地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生息,拓跋鲜卑一代代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积六十七世”,至拓跋毛立“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下传五世至推寅“南迁大泽”^[1]〔卷1,《序纪》P.1〕。在迁出原始居住地之前,拓跋鲜卑先世在大鲜卑山生息繁衍大约2000年或更长的时间(每世按25~30年计算,70余世,至少有1750~2100年),处于原始社会石器时代阶段^③。拓跋鲜卑先祖“旧墟石室”嘎仙洞文化层出土的遗物说明,只有打制石器、骨器、陶器而没有铜、铁等金属器皿的文化遗存,证明拓跋鲜卑在这里经过了石器时代;从嘎仙洞出土的大量兽骨而没有牛、马、

羊骨殉葬的情形看,此时拓跋鲜卑没有形成畜牧经济,生产力极其低下,穴居野处,处于原始游猎经济为主的时期。文献记载当时的社会状况为“射猎为业”^[1]〔卷1,《序纪》P.1〕甚为贴切。到六十七世主拓跋毛时,拓跋鲜卑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威振北方,莫不率服”^[1]〔卷1,《序纪》P.1〕,建立了包含有九十九姓(氏族)三十六国(部落)的部落联盟时期,拓跋毛凭借“聪明武略,远近所推”^[1]〔卷1,《序纪》P.1〕成为部落联盟首领。

大兴安岭北段作为原始驻牧地,为处于石器时代的拓跋鲜卑的游猎经济提供了应当具备的自然生存条件。

伴随拓跋鲜卑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畜牧经济必然取代游猎经济。虽然在大兴安岭地区到处可见獐、狍、野鹿等野生动物,森林资源也异常丰富,但大兴安岭北部林区却不具备发展游牧经济的条件,成为拓跋鲜卑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桎梏。这里气候极为寒冷,年平均气温0℃左右;森林地区闭塞狭窄的自然环境不具备大力发展畜牧业的条件。更主要的是,三十六个部落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等促使拓跋鲜卑不得不寻找更适合于发展的新的生存空间。致使拓跋鲜卑从大鲜卑山森林地带西迁至大泽草原地区。

(二)拓跋鲜卑西南迁徙的客观因素

大泽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得拓跋鲜卑有可能迁徙此地。“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1]〔卷1,《序纪》P.2〕经过史学界的考证,大多数学者认同呼伦贝尔境内的呼伦湖即为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大泽。呼伦湖俗称达赉湖,位于大兴安岭北部西南。在此地区的考古发现也为我们提供了拓跋鲜卑迁居于此的证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完工、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后,考古学界推断它们是早期拓跋鲜卑自大鲜卑山迁徙过程中,推寅“南迁大泽”前后的遗迹。嘎仙洞出土的陶制品“从形制、加工工艺来看,与完工、

① 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第12期;王成《扎赉诺尔圈河古墓清理简报》,载《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陈凤山、白劲松《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墓》,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后文涉及此注释有关的内容不再加注。

② 潘行荣《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发现古墓葬》,载《考古》1962年第11期;李作智《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65年第6期。

③ 林幹持此说。参见《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1页。下文不另注。

扎赉诺尔墓群出土的陶器,有着相似的文化特征,但更具原始性”^[2],即嘎仙洞遗址与完工、扎赉诺尔遗迹之间存在考古上的传承关系。也就是说,拓跋鲜卑在首领推寅的率领下,走出大兴安岭密林后,向西南迁徙,来到被誉为呼伦贝尔草原明珠的呼伦湖附近。呼伦贝尔草原西部面向辽阔的蒙古大草原,东部紧邻林海浩渺的大兴安岭森林,这里成为拓跋鲜卑从大鲜卑山西迁河套阴山匈奴故地的过渡地带及中转站。与林区相比较,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水草丰美的广阔草原更适合正处在人口增长、社会进步中的拓跋鲜卑生活。可见,富饶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为拓跋鲜卑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同时,遗留于此或迁徙而来并在此创造了较为先进的文明的游牧民族匈奴人,为拓跋鲜卑迁徙至大泽提供了人文条件。

有史可查,呼伦贝尔早期的居民是匈奴人。公元前209年,匈奴人统一北方草原,呼伦贝尔地区属其三部领地之一左贤王庭的辖地。两汉时期,匈奴势力衰落,但并不能说匈奴人完全彻底地退出了呼伦贝尔地区,一部分匈奴人留在草原上^[11];抑或“1世纪中叶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分裂,一部分匈奴人从大漠南北向东北流亡,与迁向西南的拓跋鲜卑相混合”^[10],出现了鲜卑与匈奴的交融。匈奴自公元前4世纪出现于中国史册始,与中原的交往一直持续不断,深受汉民族经济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关于匈奴人的经济生活,结合《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和大量的考古发掘可知,“他们过着游牧的生活,狩猎业和农业居于次要地位。此外,匈奴人也经营一定的手工业,经常与汉人互通关市”^{[12] (P.394)}。匈奴人把从中原吸收来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间接地传递给拓跋鲜卑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呼伦贝尔已发掘的扎赉诺尔31座古墓葬、完工6座古墓葬出土的器物中,有质地较粗糙的陶器、打制磨制的石器、骨器与大量铜器、铁器及金银器、珠饰和蚌壳饰、产于中原的绢和麻布,这些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遗物并存,应该视做“同一个历史时期内,各民族发展不平衡,但相互之间,在经济上、文化上又有着密切的交往,而彼此相互影响的结果”^[13]。“双耳铜鍱和各种动物形铜饰都具有明显的匈奴器物的风格……锻制的马具和武器,其形制表明它和匈奴同类器物相接近”,这里被发现的遗存和相关遗

物,有一些具有相当浓厚的匈奴文化因素,“匈奴的影响这个时期最突出”^[10]。

在匈奴对大泽时期拓跋鲜卑的影响方面,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对扎赉诺尔墓、完工墓的颅骨与时代相近的贝加尔湖西部地区的匈奴墓的颅骨平均数进行比较后,得出了他们“与匈奴组之间的组差一般都比较小,反映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较为密切”的结论;具体比较匈奴墓与扎赉诺尔墓颅骨平均数所表现出来的异同性后,进一步指出,数据的异同性“或许正是种族上存在着一定亲缘关系的反映,扎赉诺尔组中也可能含有某些匈奴的血统”^[14]。从人类学上指出扎赉诺尔人具有匈奴血统,这无疑是一项重要发现,表明此时的拓跋鲜卑在血缘上已与匈奴融合^[11]。

经过呼伦贝尔湖区的发展,拓跋鲜卑的社会形态、经济生活、生产工具都发生了一系列根本的改变,历史进程步伐加快,社会形态较大鲜卑山时期取得了长足进步。拓跋鲜卑从邻近的民族尤其是匈奴人那里吸取先进的文明因素,生产力水平受匈奴影响迅速提高。随葬品中数量较多的铜器、铁器,标志着拓跋鲜卑的社会形态已由嘎仙洞时期的石器时代发展到呼伦贝尔湖区的金属器时代;墓葬中殉葬数量不等的牛、马、羊骨表明,此时其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贫富差距。拓跋鲜卑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发展畜牧业生产。从墓中出土数量较多的骨镞、铁镞、铁刀、铁矛、弓囊等武器,以及有大量牛、马、羊骨殉葬的情形看,当时这里的畜牧业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

二、拓跋鲜卑西迁匈奴故地之原因

推寅率部在大泽生息七世,大约200年左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但“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诃汾继位,率部继续迁徙,“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1] (卷1,《序纪》P.2)}。因呼伦湖地区“未足以建都邑”,不再适应拓跋鲜卑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在邻、诃汾父子的率领下,拓跋鲜卑走出呼伦贝尔草原,寻找适合建都邑、更宜于自身发展的广阔天地。

拓跋鲜卑自大泽迁出,到匈奴故地,由于其迁徙的具体路线和方式史载不明,很难作出直接的描述,非常有可能的是呈扇形方式进行大规模的民族

迁徙。4~6世纪日耳曼民族大迁徙、8世纪中叶开始的蒙古各部迁徙均以这种方式进行,对游牧民族早斯的迁徙,可相互比较,但还需要考古发掘的证明。到目前为止,可供参照的是1962年对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遗址和墓葬^[7]的考古发掘。拓跋鲜卑自呼伦湖地区迁出后,南向穿越地势险要的大兴安岭,到过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境内;之后再西迁至今阴山河套地区匈奴故地。究其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南邻的东胡部落联盟成员乌桓、东部鲜卑长期占据辽东,拓跋鲜卑南迁受阻

20世纪60年代,在对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遗址和墓葬进行发掘后,考古学界证实“在大兴安岭南段东侧辽河支流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发现了与扎赉诺尔墓群极为相似的遗迹”,与文献中记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的情形相符合,得出拓跋鲜卑自大泽迁出后,在“巴林左旗一带停留了一段”^[10]的结论。从墓中遗物五铢钱及遗存特征分析,时间约在1~4世纪左右。据此,此时的拓跋鲜卑社会进一步发展,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男子的政治、经济地位明显高于女子,出现贫富差距和男女分工。墓葬显示:男女的棺木存在差异;随葬品数量不同;随葬品中的铜饰和珠饰多出现在女性墓中,铁随葬在男性墓中,等等。“南杨家营子墓群所反映的拓跋部落的较大变化,是与匈奴混合和日益邻近汉族地区以后发生的。”^[10]从这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出,拓跋鲜卑与历史上其他民族一样,对文明程度较高的农业区有着向往之心,曾南迁到今赤峰市,或有意继续南迁。但南邻的乌桓、东部鲜卑长期占据辽东,使拓跋鲜卑南迁受阻。

东胡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较早发展起来的部落联盟,因位于匈奴之东而得名。公元前3世纪,一度势力鼎盛,可与匈奴相抗衡。秦末汉初,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部落联盟的主要成员鲜卑退保鲜卑山(学界称其东部鲜卑)^①,“远窜辽东塞外”^[15]《卷90,《乌桓鲜卑列传》P.2985》。乌桓退保乌桓山,经公元前119年徙“五郡塞外”^[15]《卷90,《乌桓鲜卑列传》P.2981》和公元49年“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15]《卷90,《乌桓鲜卑列传》P.2982》的两次迁徙,实力有较快发展至东汉末年,乌桓在边塞附近的势力始终不容忽视。位于乌桓北部的东部鲜卑的驻牧地,虽然伴随乌桓的南迁也逐渐向南移动,但始终没有迁入塞内,西拉木伦河流域仍然是东汉中期前后东部鲜卑的驻牧中心。在东汉朝廷的大力扶持下,在吸收融

合了塞北乌桓^[16]和十余万落匈奴后,东部鲜卑实力于东汉后期迅猛增长,成为当时塞外最强盛的民族。此二部在与匈奴、两汉有战有和的交往中,长期盘踞在辽东边塞附近地区,势力强盛,成为拓跋鲜卑南迁中原的障碍。

在此之后,檀石槐部落大联盟的出现为拓跋鲜卑的西迁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二)檀石槐部落大联盟的出现,成为拓跋鲜卑西徙的至关重要的原因

拓跋鲜卑的活动中心西移至河套阴山匈奴故地与檀石槐部落联盟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东汉桓帝时,东部鲜卑大人檀石槐势力强大,“立庭于弹汗山,歃仇水上”^[15]《卷90,《乌桓鲜卑列传》P.2989》。随后,南向抄掠汉朝边塞,对周边其他部族的丁零、夫馀、乌孙,兵马甚盛的檀石槐或拒或却或击,尽据匈奴故地,达到极盛。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一广袤领土,檀石槐将其辖地分为三部,其中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置大人推寅等统辖。有学者分析,《魏书·序纪》中神人之言“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即是檀石槐的命令,“神人”即为檀石槐。按照檀石槐的部署,归属檀石槐的拓跋部首领率部徙至匈奴故地^[17]。

据马长寿提出的“这里的推寅即为拓跋鲜卑第二推寅郎”,“献帝邻命其子诘汾南迁,诘汾所徙止之地即日后力微所在之地,亦即汉五原郡之地,其地有古代的头曼城,故谓之‘匈奴之故地’”^[18]《P.241-242》。据曹永年考证^[17]2世纪中叶,邻的居地南对“自上谷以西至敦煌”。到神元皇帝拓跋力微时,先“率所部北居长川”,后“迁于定襄之盛乐”,拓跋鲜卑在以长川、盛乐为中心的河套阴山地区继续壮大^[19]。

匈奴故地所在河套阴山地区是一个气候适宜、水草丰美的地方,适合农牧业发展,是理想的牧场。秦汉时期,这一地区是中原地区的最前哨,曾被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占领。1~2世纪的东汉时期,随着匈奴势力的衰落和南迁,该地为檀石槐联盟成员拓跋部占据。在首领诘汾及子力微的领导下,生产发展,经济模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畜牧业、农业发展呈现上升趋势。史载“圣武帝(诘汾)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1]《卷1,《序纪》P.2》此处“田”应为耕种、耕

① 按照最早驻牧地,鲜卑包括两支。驻牧于大兴安岭南段的鲜卑,也称东部鲜卑;发源于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也称北部鲜卑,即拓跋鲜卑。

垦之意,从事农业耕垦即有数万兵卒。取均数五计,再以五人出一战士,拓跋鲜卑总人口至少在25万以上。到力微发迹时,“控弦上马二十余万”^[1]〔卷1,《序纪》P.3〕,人口已上升至约百万左右。在古代社会,人口数量是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这条史料证明拓跋鲜卑迁居匈奴故地后,极其重视发展农业,农业、畜牧业都处在了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生产发展为迅猛增长的人口生存提供了物质保障。

三、本族英雄人物的出现是 两次迁徙成功的主观条件

为众人所推举的英雄人物推寅、邻的出现,是拓跋鲜卑走出大鲜卑山、大泽,西迁至匈奴故地的共同因素。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外部条件具备,需要强有力的首领时代到来时,必然会产生强有力的首领。两次迁移,“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1]〔卷1,《序纪》P.2〕。

拓跋鲜卑积六十七世至毛,毛凭借“聪明武略,远近所推”^[1]〔卷1,《序纪》P.1〕当选为首领。遵循这一传统原则,拓跋毛下传四世至推寅,推寅下传六世至邻。宣帝推寅、献帝邻皆因具有威信、符合部众需要及钻研的品质才为众人推选为首领的。在诃汾之前,拓跋部的军事首领完全是按才干选举出来的,与世系无关。这种情况也符合处于氏族部落之阶段的社会特点。选举出聪明、有远见、有谋略、有军事指挥才能的首领,是确保自己生存、进行掠夺和战胜其他邻族的重要条件。推寅、邻、诃汾正是具有这样杰出的个人才智,凭着自己的经验和卓见,率引族人迁徙到资源丰富的游牧射猎区域进行生活、生产宏伟蓝图的设计师和践行者,成为受到部众拥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出现是拓跋鲜卑两次成功迁徙的又一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 [1] 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 米文平. 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J]. 文物, 1981, (2).
- [3] 陈凤山. 等. 呼伦贝尔市团结墓地[A]. 魏坚.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 [4] 程道宏. 伊敏河地区的鲜卑墓[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2 (2).
- [5] 云茹. 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发现一座鲜卑墓葬[J]. 北方文物, 1987 (4).
- [6] 赵越. 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J]. 考古, 1990 (10).
- [7] 刘观民. 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J]. 考古, 1964 (1).
- [8] 郑隆, 李逸友. 察右后旗二兰虎沟的古墓群[A].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A].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64.
- [9] 杜承武, 李兴盛. 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A]. 魏坚.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 [10] 宿白. 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J]. 文物, 1977 (5).
- [11] 曹永年. 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J]. 历史研究, 1987 (5).
- [12] 马利清. 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 [13] 李作智.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J]. 考古, 1965 (6).
- [14] 潘其凤, 韩康信. 东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J]. 考古学报, 1982 (1).
- [15]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6] 王庆宪. 乌桓鲜卑势力的消长[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1 (4).
- [17] 曹永年. 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J].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7 (4).
- [18] 马长寿. 乌桓与鲜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 [19] 舒顺林. “匈奴故地”初探[J].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3, (1).

(责任编辑 何天明)